

扎根区域教育实践多年的北京市朝阳区教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世元，日前推出了一本新书——《理想教育文化建构：“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的理论与实践》。在王世元看来，中央“双减”等系列强有力的举措恰为我国教育文化的变革创造了契机，教育人当行动起来，于日常教育教学点滴中积极谋变，顺应时代呼唤，参与引领伟大的教育文化之变革，引导人们过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新生活。

教育人当于点滴处谋变引领

——与北京市朝阳区教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世元对话教育文化变革

本报记者 贺春兰

(一)

教育在线：最近围绕“双减”，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作为一线工作者，您怎么理解中央的系列举措？

王世元：我认为中央采取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意在回应时代对教育价值乃至整个教育文化转向的需要。

教育在线：听起来有些抽象，能否说具体一些？

王世元：是的，听起来抽象，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影响着置身其中的每个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当然，毫无疑问，也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改革开放后，纵观我国教育改革，我将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恢复高考，即恢复知识教育阶段。二是恢复高考后，知识教育愈演愈烈，片面追求升学率主导了基础教育发展方向，扭曲了基础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本质，从而开启了素质教育探索阶段。三是党的十八大为标志，突出对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的回答，实施国家顶层设计的教育综合改革，进入了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我看来，是从理念到制度进入了全方位的由中央引领推进的新的教育文化生成阶段，以适应社会新的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的需要。

教育在线：具体怎么讲？

王世元：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少子化政策的实施，社会对教育予以了空前的关注，但教育价值观上依然故我，虽经不断扩招，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度提高，如今毛入学率已达50%，“学历主义”现象依然盛行。由于自中小学便开始的为应付选拔而导致的过度训练，导致学生研究与创新的兴趣、动力、能力的弱化甚至消解而饱受诟病。

教育在线：历史上针对应试教育弊端我们一直在努力，从政府到教育学术界，素质教育已经提了多年，减负也一再被提及，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效果不理想呢？

王世元：为改变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状况，1999年6月，我国召开了全国第三次教育大会，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自上世纪末以来，全国围绕素质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坦言，上述一系列教育改革，教育的顽瘴痼疾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对教育价值的体认还没有形成共识。整个社会还停留在以追求知识价值为主流的教育文化场中，也停留在以知识为中心的路径依赖中。整个教育文化仍然是知识为重的文化，所以，任何局部的改革最终都被汹涌的应试浪潮吞没了。

教育在线：一方面家长呼喊孩子被作业压榨成了“豆芽菜”，另一方面，家长又怕自己的孩子学得少，未来在考试选拔中吃亏。

王世元：是啊。国家倡导的主流教育价值和老百姓个人的追求似乎并不一致。事实证明，转变教育观念如果没有具体的配套措施，教育改革难以取得实效。不仅仅家长，包括教师等教育工作者事实上也依然故我，很多地方官员在谈教育成绩时，也常常是以升学率之高低举例。所以，尽管历经改革，教育负担不减下来，教育没有从根本上改观，人们对教育怨声载道。

教育在线：这种集体的纠结、挣扎，需要外力来纠正。

王世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更以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为标志，直到现在的整个“双减”的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继续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上，从县域教育均衡评价改革到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干部教师队伍建设、资源配置方式、教育经费保障、课程改革、入学招生考试改革、对学校及学生评价改革等，出台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教育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层次之高、推进之深入，当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

在我看来，中央这次全方位的改革意在引领全新的教育文化。今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单一的“物质文化”追求已经转向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教育在线：而我国教育发展尚没有能够主动适应，在各种力量的裹挟下，尚在划延长线。

王世元：是的。一任这样的情况继续，一方面不能满足民族复兴对创新型人才的需要，现代社会对现代国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家长焦虑内卷出现了种种怨言绑架着教育也绑架着家长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央这系列大刀阔斧的举措，让我们看到了中央强力



针对课后服务，北京市朝阳区整合了100余家单位供给近200项活动资源，满足孩子们的个性化选择。图为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开展的课后足球兴趣班。

扭转已经持续很久的一种旧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文化的决心。

(二)

教育在线：您的意思是，新的时代需要呼唤新的教育文化支持？

王世元：是的。新时代，昭示着我国教育应凸显其对人本身的关照——让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即实现由“纯粹知识教育”向“育人价值”的转变。通过“育人价值”的引领，追求全社会对每个人的终极关怀，满足人们对尊重、民主的需要，对责任担当、科学精神、审美情趣等的需要，借以凸显对人的精神文化的关照。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知识的出现，生产力获得较大提高。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科学知识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唯一而有效的方法。所以现代社会的教育价值，是追求实用的科学知识。后现代社会时期，在科学知识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收获时，也带给人类深刻的反思。人类不断地掌握、生产足够的知识，其目的，无非是让人类的物质生活更丰富、生活更方便，最终，让人类从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到那时，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人类还以获取知识为唯一目的，那么人类穷尽精力、无休止地掌握知识、生产知识，岂不成了纯粹的知识容器和生产知识的工具吗？就储存知识数量来说，又有谁能够超过智慧机器人呢？我看，当人类自身只有知识，而没有对个体人文关怀时，人类才是世界上最需要怜悯的生物。所以，在我看来，后现代教育的价值，是以人为核心的对个体物质与精神的整体关怀。

教育在线：当前似乎全社会仍然还没有形成共识。

王世元：在我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现状，唯有文化路径的重新选择和塑造。因为，只有改变人们赋予教育的价值追求，进而形成人们对教育新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时候，教育才能发生根本变化。否则，教育改革仍然只能走延长线，而难有实质性突破。

传统教育文化追求的价值是“纯粹知识传授”，这一价值追求，决定了教育评价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导向。对此，很难回答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之问。如果不动摇传统教育文化价值追求，我国教育综合改革，便难以突破从家庭、政府到社会形成的传统教育文化舆论场。

当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方向，与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相比，在怎样培养人的方法上，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实践方向上还有偏差。主要表现在：仍然停留在以知识教育、升学教育主导的教育方向，人文关怀明显不足。这也说明我国教育当前正处在一个由现代教育向后现代教育的转型时期。为把新时代教育文化落实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需要教育工作者作出转化。以共同的教育价值，营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环境，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前，在中央层面，新时代的教育方向

已经非常明晰，即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讲，确立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立德树人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教育为今天我国教育的核心价值。以此赋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价值追求，并促使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即力推形成新时代的教育文化。

教育在线：就你们在基层的实践看，对这次改革有信心吗？

王世元：难得中央有如此坚定之决心。目前“择校热”、儿童超前教育、中小学课堂教学顽疾，被进一步遏制。当然若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任务依然艰巨，在依靠中央政策推进的同时，一线教育实践者也要以高度的时代使命感在校园里、在课堂中起而行之，积极谋变。落实中央精神，积极引领一种全新的适应新时代的教育文化。

(三)

教育在线：您最近推出了一本专著，提出了理想教育文化的构建，什么是您认为的理想的教育文化？

王世元：在我看来，新时代教育文化是“育人”的教育文化，是赋予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要培养人格的文化。具体讲，新时代教育文化，即理想教育文化，一是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着眼点，既重视传授科学知识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历史上许多的教育发展的核心地位，以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着眼点，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社会主义培养“最佳公民”；反过来，让理想的“最佳公民”反哺新时代个体的教育生活。三是尊重个体差异，让每个个体都能充分发展、享受适合的教育。四是以理想教育文化价值引导个体、家庭、社会构建新的教育文化场，为我国教育综合改革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由此，在扬弃传统教育文化基础上，构建新时代教育文化。

教育在线：教育文化的转变虽然不像推广某种教学模式那样容易，但却能够带给教育更深刻、更持久的变革。

王世元：教育改革一路走来的历史证明，人们如果不改变传统教育文化，即追求“纯粹知识价值”的教育文化，那么，不管教育如何进行课程改革、方法改革、工具改革、管理改革、选拔方式改革、资源配置等改革，都难以动摇教育追求“纯粹知识价值”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历史上许多的教育改革没有走出“文件”，没能走进学校教室，更没有走进校长、教师的思想中。不仅如此，更由于地方政府及其社会重要人士，评价教育、评价学校、评价学生依然用知识教育的成绩，作为重要标准或唯一标准，所以，教育改革内外交困则不言而喻。

教育在线：您认为中央在制度层面大刀阔斧的改革恰恰创造了气候和契机，教育人要用好这一契机，践行引领助推教育新文化的形成。

王世元：是的。如果让人们自然地过一种理想的教育生活，除需要政府倡导外，也需要有更多教育人率先行动起来以积极

引领。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人类“新生活”转变的载体，主要是“方法”创新、“工具”发明和“技术”改进等。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率先提供清晰、有效的教育方法、工具与技术，那么新的教育文化，就不知不觉地形成了。或者说，人们在不知不觉地过一种新的教育生活。

教育在线：所以，新的教育文化构建需要教育界全体作出努力，从微小处努力，在校园在教室中积极谋变。从实践来看，您在北京市朝阳区如何通过“技术再造”，引领新的教育文化？

王世元：朝阳区一直在进行从校园文化、学校文化到区域教育文化的倡导与实践，引导教育文化的革新。最近5年来，我们将关注点放到了学校课堂的革新上。我们通过科研课题，根据自愿的原则，从幼儿园到高中，选择薄弱学校切入，邀请老师们参与了一个“理想文化课堂”的实践，由学科专家手把手介入陪伴带领老师们从课堂设计入手，践行一种新的和学生积极互动的合作对话式的课堂文化。在课堂中，老师们要秉持“尊重意识、民主思想、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做到和学生平等沟通、积极地互动对话。

教育在线：做到这点很难吗？

王世元：就我们的实践来看，并不容易。老师们在传统的教育文化中长大。已经习惯于教师中心、习惯了满堂灌输、习惯了知识传递。

教育在线：就您提的这些，在教育界我们也听了多年，比如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从教师为主体到教师和学生双主体说。数十年来，教育界也一直在做着孜孜以求的努力。就您所倡导的这场所向薄弱学校的教育实践而言，与之前我们的一次次教育实验探索，有什么不同？

王世元：有传承也有在新时代背景下新的体认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师生之间不是割裂关系，更不是纯粹的主客体系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双主体关系，而是合作成长共同体关系，这一关系的确定，实际上也就确定了学生自身的责任。二是学生成长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家庭和社会的事情。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合作成长共同体的关系。由此，关于学生成长，有两个相对清晰的边界：一个是家校边界；另一个是学生生长边界。家校边界，决定了家校是协作关系；学生生长边界，决定了学生自身是生长的主体。所以，学生成长不仅需要借助家庭和社会，更需要对学生本人或唤醒、或激发。

以前的各种教育创新模式，多少有一点孤军奋战的味道。我们特别强调了家长的力量，提出了培养社会最佳公民的概念，强调教育的目标是要把这些学生培养成为最佳公民，而他们到社会上后，亦成为反哺教育的良好土壤。

所谓文化建构，就必须是整体的、全员的，只有全员参与创建也才能全员得到浸润。所以，应该说，我们关注了整个教育生态和其中的每一类主体及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在家长、学生个体和学校教师的多元互动、平等对话中促进新的教育生态和教育文化生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无数英语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的共同努力，中国英语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英语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培养出满足新时代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需要的英语人才，已成为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要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这为新时代中国英语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英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竞争加剧、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与民族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中国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迫切需要高层次英语人才发出中国声音，掌握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前沿科学和核心技术上，急需既懂专业知识又能用英语有效交流的高级人才，抢占国际科技创新高地。然而，我国英语教育长期存在“两张皮”现象：英语专业人才不懂学科专业知识，学科专业人才不具备英语有效交流能力。为应对这一现象，很多院校的英语专业推出了“英语+专业”的培养模式，但效果不佳。原因有二。一方面，英语专业学生多为文科生，学习科学技术存在困难；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水平长足发展，已经从单纯学习借鉴转变为学创并举和自主创新。仅用英语进行简单、初级的专业信息交流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既需要从事国际政治、外交等事务的英语专业人才，更需要能用英语有效交流的各学科专业人才。

新时代中国英语教育要着力培养各学科专业英语人才。为使各学科专业人才具备有效的英语交流能力，中国英语教育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平衡学科英语和生活英语。受英语交际教学法的影响，中国英语教学中充斥着大量的生活英语。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学习生活英语，既无日常交流的需求，又不能满足日后工作需要，事倍功半。而在英语教学中加入学科知识，既能学习语言形式又能丰富知识体系，一举两得。其次，要平衡人文知识和理学知识。目前英语教学存在重文轻理的现象。这既不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又降低了偏好理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学生所处年级越高，这一现象越明显，这与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背道而驰。因此，中国英语教育要平衡文理知识，面向全体学生。此外，要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并举。功能是形式的目的，形式是功能的载体，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颇。只注重语言交际功能，语言形式不准确，只能应付日常交际，无法从事重要社会经济活动和高精尖科学技术工作。相反，语言形式精确，却不能有效交流，亦不能达到新时代中国发展对英语人才的要求。因此，英语教学要语言形式与功能并举，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新时代英语人才培养要为我所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观念是不能离开语言而直接存在的。因此，新时代中国英语教育要慎防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渗透，让培养出的英语人才真正为我所用。首先，要提高英语教师的思想意识形态意识。可通过集体备课、教研研讨、专家讲座等形式逐步提高英语教师的意识形态意识和辨别能力。其次应注意英语教材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在教材编制过程中，可加入反映中国思想、文化和生活的英语教学内容；亦可加入思想意识形态较为中立的学科知识，以此降低对英语原版教材的依赖，有效防止西方意识形态借助英语教材渗透中国。最后，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家国情怀、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的人才培养难免落于为人做嫁衣的境地。因此，中国英语教育应增加反映古今中外放弃优厚待遇回国报效、舍生取义之仁人志士的爱国事迹，以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样方可保证培养出的英语人才既符合新时代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需要，又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终生。

(作者齐成龙为首都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李杨为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和新学期的到来，位于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渭州学校把校外社会实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积极探索实施素质教育。图为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陇西药圃园，渭州学校的学生参观中草药标本室。

齐成龙 李杨

新时代英语人才培养要立足中国立场

新华社发